

赴国难、爱中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的抗日救亡运动探析

周东华

内容提要 在中国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基督教学校能否如中国的国立教育一样爱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纵观抗战期间的浙江基督教教育,无论是基督教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坚持人格救国的另类基督教教育机构还是直面救亡的基督教医疗教育机构,虽蒙受巨大损失,但均能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或在流亡中办学,弦歌不辍,直至停办,是谓“积极的有为”;或严格律己,抵制寇伪诱降和大后方安逸生活,是谓“消极的有不为”,两相结合,有力地为中国“造就领导民众人才”,修正了晚清以来其被固定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旧时的形象,彰显出如中国国立学校一样的国民品质和国族认同。

关键词 浙江基督教教育 抗日救亡 国族认同与实践

早在1909年,一位之江大学毕业生从美国来信,称:“爱国主义是我人生旅途的目标,如果必要,我愿意为我们亲爱而伟大的、古老国家牺牲自我……简言之,宁要没有基督教的中国,勿要没有中国的基督教。如果基督教与中国不能并存,或者基督教将扰乱或控制中华民族的生机,那么,我们基督教徒中的大部分,宁可不要基督教。”^①晚清以降,随着中国国族重建(Nation—Rebuilding)任务的加深,中国基督教徒与基督教机构内的有识之士萌发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精神。居于期间的基督教教育,亦不能例外。在《民国初年江南教会女生集体记忆中的国族认同》一文中,笔者以江南地区,包括浙江在内的教会女学生的国族认同与实践为例,详细论证了清末民初30年左右时间内浙江基督教教育的国族认同问题。^②

如果说这种国族认同和“争当国民”尚处于纸上革命的话,那么,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给了在华基督教教育一个全面证明其国族认同与身份建构的机会。曾弥白称:“我辈青年是负有多大的责任呵!同学们!快快起来为我们的前途而奋斗,为我们的民族而挣扎吧!”^③抗战期间的浙江基督教教育,其表现为何呢?由于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与浙江基督教教育的

① A Chinese Student in America. “The Nationalism of a Chinese Christian”,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L, No. 3, March 1909, p. 152.

② 周东华:《民国初年江南教会女生集体记忆中的国族认同》,《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

③ 曾弥白:《论韩人尹奉吉》,载于《弘道20周年纪念刊》,第711页,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旧36—1—12。

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①，故给了笔者一个拾缺补遗的机会。

一 “共赴国难”：流亡中弦歌不辍的浙江基督教基础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浙江的教会学校立即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中，以宁波甬江女中为例，“九一八之变，本校学生，咸思自效，组织抗日救国会，藉游艺会募捐，集券值，购大量木棉布帛，手制百褥，以犒前方战士。1933年春，复布市制衣，输赠东北义勇军。其爱国微忱，实有足多”。^②

抗战爆发后，浙沪浸礼会向浙沪两地基督教教育机关发出通知，内称：“一、学校方面——各校开学日期已届，希望照原有计划开学。近悉教厅已颁布战时教育之办法，谅各校均已收到并祈在政府指导之下照常进行工作。二、医院方面——在非常时期议会对于医院早有表示，希各医院尽量与政府合作，办理预防及救护诸事。三、教育方面——当从事(1)使大家有战时应有之知识，如明白防空救护等办法；(2)使大家有战时应有之镇静态度，如不信谣言等；(3)应与就地政府或人民团体尽量合作做准备等工作；(4)为国家深切祈祷。”^③浙江各基督教教育机构，都按原定计划开学。以之江大学为例，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后，之江大学按照原定计划，“在9月15日开学，350名学生前来注册上课”。^④11月9日，日军在杭洲湾登陆，侵犯矛头直指杭城。在此危难时刻，之江大学于11月14日召开教职员紧急会议，共商时局问题。最后，会议决定立即将学校迁离杭州，或往建德、或往安徽屯溪，以策安全。由于浙江大学已经迁移到建德，会议最终考虑将学校迁往屯溪。^⑤会议第二日，之江校长李培恩率领明思德(Robert J. McMullen)等人前往屯溪考察，发现那里有不少茶商的大仓库，很适合用作教室，遂与当地乡绅商议租用这些仓库办学。^⑥然而，尽管浙沪浸礼会等呼吁不要相信谣传，但谣言已经帮之江大学作出了决定。当李培恩等于17日回到杭州时，发现之江师生因谣传日军逼近杭州而已经匆忙撤离杭州，“只有12名教职员和一些苦力还留在校园里”。^⑦

随着浙江全省主要县市沦陷，基督教教育受到相当的冲击。日军战火所到之处，“不甘沉沦敌区”^⑧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其他公私立教育一样，“于抗战期间，服务自由区，颠沛流离，备尝艰辛”。^⑨不愿事敌的基督教教育被迫四处流亡，坚持办学，体现了作为中国“国民”的品性和国格。

从整体上看，抗战期间浙江基督教教育“共赴国难”的举措，可分为以下三段：(一)在日军战火正式燃及之前，做好预警防范工作。七七事变后，“甬城迭遭敌机肆虐”，甬江女中“为谋师生等安全

① 关于抗日战争与浙江基督教教育问题的研究，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了队克勋的《之江大学》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外，其余的研究仅仅只是涉及相对主题时有所提及，如芳威廉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刘家峰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刘家峰和刘天路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有关基督教中等教育，目前仅见毛树坚：《四千里流亡求学与五次易地办学——嘉兴秀州中学师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流亡经历》(《古今谈》2006年第1期)一文。

② 《甬江女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第1页。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10—1—104。

③ 鲍哲庆：《浙沪浸礼议会通告议会各机关应注意非常时期之准备工作》，1937年8月12日，载《真光杂志》第36卷第10号，1937年10月，第52页。

④ “Letters of Robert J. McMullen”. Oct. 6, 1937, in *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hereafter “UBCHEA”), 160—3032.

⑤ “President Report, 1937—1938”, in “UBCHEA”, 160—3016.

⑥ “Letters of Robert J. McMullen”, Nov. 20, 1937, in “UBCHEA”, 160—3032.

⑦ 队克勋著，刘家峰译：《之江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⑧ 宁波青年会呈，永字第13号，1943年7月16日，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30—1—50。

⑨ “为呈请发给救济物品仰祈鉴核照准由”，甬字第念号呈文，1946年5月10日，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10—1—313。

起见,乃迁至奉化亭下镇办学”。^①另一所教会中学——宁波三一中学,亦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卢沟桥变起,抗战军兴,都市遭遇日机轰炸,本校为策安全计,暂迁至蜜严授课。后又迁回城中。一面于1938年2月,设分部于浦江沈家,聘费可……为主任,凡教职员10余人,学生百余人。校长朱天临往来甬浦以督理之。”^②1940年日军越过钱塘江之前,隔江对峙的日军时不时派兵偷渡钱塘江或派飞机骚扰宁绍地区。在此情况下,甬江女中继续做好预警工作。1938年5月4日,甬江女中迁移到奉化亭下继续办学。1939年春,日军偷渡钱江,占领萧山,直逼绍兴,浙东形势骤然紧张,甬江女中“为顾全学生学业起见,冒险开学”。^③日军此次偷袭,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困守萧山,无力进犯绍兴,才使得甬江女中“冒险开学”变得相对平安,获得一学期平安开学的契机。为应付宁绍地区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甬江女中另在宁波西边设立分校,以防不测。沈貽荃在1939—1940年度的校长报告中称:“本校自本年度起,在鄞西接待寺设立分部,专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本学期以其设备简陋,殊感不便,乃迁入战船街原校。为管理便利及一遇紧急事,易于疏散起见,专收通学生(按:非住校生,即放学回家居住的走读生……笔者注)。分部学生家长原多位于宁波城区,通学并无不便。其间有住于他处者,则劝令改入亭下本部。故学生人数影响甚微焉。”^④三一中学则于1938年夏在诸暨重新设立分校,以备不测。本校分部“移至诸暨十四都,委教务主任姚柄谦为分部主任,假其地凤翔学校为校舍,招收新生百人,并浦校旧生,凡二百余人”。^⑤

(二)流亡办学,弦歌不辍。随着日军战火蔓延至浙江全省,最初在本市或邻近县市开办分校以为预警措施的作法,显然已不足以维系安全。浙江省境内各基督教教育机构,随日军侵犯的不断升级而不停迁校,坚持办学至最后一刻。金华作新中学,原本分为本部与分部,在本部一部分曾被敌机轰炸,房屋略有损坏。分校及教牧住宅,因邻近被炸房屋,亦受震动,惟损伤极微。“目下该校无开学希望,洪如圭校长与范立人先生及眷属等,仍住在校内,作开学谋划”。^⑥杭州蕙兰中学在1937年日军进犯杭州时,“遵令迁往场口,后因富阳沦陷,场口地方危在旦夕,复迁往上海,与杭州之江大学附中,弘道女中、嘉兴秀州中学等校联合办理华东联合中学,继续开课。至1941年12月8日,上海陷于日军之手,属校以贯彻初衷,不甘受敌伪组织管辖,毅然于12月9日停办”。^⑦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三一中学在宁波市区的本部解散,并入分部,“勉力维持,卒能毕业两届。至1942年,诸暨县城又遭沦陷……乃于1943年2月西迁于浦江之马剑。马剑在万山环抱中,地极安全,学生激增。本校为安顿失学青年,计呈请浙江教育厅添办高中。教厅准予备案,乃设高中四级、初中六级,全校学生增至300余人”。^⑧宁波甬江女中在“奉化、溪口继甬地沦陷”后,“不得已停止办学,遣送一部分学生至上海教会中学借读,一部分遣内地”。^⑨

浙江教会学校在抗战期间的流亡办学,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嘉兴秀州中学的经历。^⑩当时的秀州中学崇德分校高三学生王文江在其回忆录中,真实地记载了秀州中学第一阶段的流亡办学经历:“七七事变,抗战启幕,‘八一三’起,禾杭一带亦陷于空袭恐怖之中,文化机关竟亦为敌人空袭目标

① “甬字第19号呈文”,宁档:旧10—1—313。

② 《鄞县私立三一中学校史》,1948年4月编,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10—1—74。

③ 《甬江女子中学校长报告书》(1939—1940),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10—1—308。

④ 《甬江女子中学校长报告书》(1939—1940),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10—1—308。

⑤ 《鄞县私立三一中学校史》,1948年4月编,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10—1—74。

⑥ “金华通讯”,载《真光杂志》第37卷第5号,1938年5月,第55页。

⑦ 蕙兰中学呈教育厅、市政府文,1945年10月25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号:旧38—1—90。

⑧ 《鄞县私立三一中学校史》,1948年4月编,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10—1—74。

⑨ “鄞县私立甬江女子中学复员及概况”,宁波档案馆藏,档号:旧10—1—103。

⑩ 俞沧泉:《校史46年》,《秀州钟》复刊第一期,第76—79页。

之一。吾校地处沪杭交通中心之嘉兴，空袭自属难免。复因学生人数众多，乃疏散于三处上课：计初一、二在桐乡；初三高一在新胜；高二、三在崇德。”其所在分校处于崇德，地处偏僻，上课设备虽然很差，但是同学“咸能安心求学”，但仍然时有日军空袭。1937年10月7日该校开学，11月5日学校遭遇日军轰炸，顿时“人心惶惶，学校乃下令停课一礼拜”。但时局越来越危险，一周后复课已无望。崇德分校师生开始谋划流亡。王文江得知秀州另外两处分校——桐乡和新胜——无家可归的年幼同学都集中在洛舍镇，于是设法前往。顾校长令其随同前往杭州，待发现杭州沦陷，以学校所有存款分于学生，每人得40余元，“全体流亡师生遂按照校长之命令分为数小队向各内地奔难”。其所在的小队，经过临安、桐庐、严州、金华、南昌、向塘、株洲、湘潭、长沙、常德。在常德半年，他和秀中师生一起成立“求是补习学社”，合伙经营“活水茶楼”，筹划成立秀州中学常德分校等。后因局势再变，他被迫前往广州、香港，最后抵达上海，在原秀中顾校长担任校长的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读书，“停顿8月余之求学生活已重温矣”！^①

(三)“孤岛”办学。秀中校长顾惠人到达上海公共租界后，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找来避难校长开会，决定筹设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推举秀州顾惠人、杭州弘道周觉味等校长着手筹划，先行登记报招。会议规定“凡战区基督教中学学生得免试入学”。其招生广告写道：“(级别)高初中春季各级插班生及借读生。(考期)1938年2月12日上午9时起。(报名)2月7日起11日止，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考试科目)国算英口试(地址)报名及考试地址，均在江西路北京路北首451号5楼。”^②联中正式开学后，有学生355人，其中秀中中学学生“百人左右，教职员占10余人”。除了最初开办的七校——嘉兴秀州中学、杭州弘道女中、蕙兰中学、之江大学附中、江阴的辅实中学、励实中学、南京的金陵附中外，后来规模扩展到“16个学校，1000余学生，70余教职员”。联中实行“自助免费制”，“组织清寒学生自助减费委员会”、“垦业社”等。当时宗教活动频繁，学习氛围浓郁，成为青年学生展示“爱国的热情和活动的的能力”的大舞台，“光射于敌伪环视的孤岛中，引照了无数纯洁的青年，为国家保卫了一部分的元素”。^③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旋即解散，秀州中学再次陷于流亡之中。根据当时秀州中学学生毛承恩的记载，1942年1月间，他们从上海到杭州再前往金华。但因他生病，返回上海。第二次取道萧山，前往金华。在金华教会学校作新中学校内，之江大学办事处和秀州中学办事处成立，谋划华东基督教中学内迁一事。秀中的金华办事处成立后，“一方面协助同学登记申请教部分发，以免荒废同学学业；另一方面，成都毕凡宇先生自川来婺，筹商复校事宜”。顾校长当时考虑从金华、邵武和赣州选出一处作为复校地点。但到5月，日军开始侵略浙东，金华、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再一次流亡，绕过衢州，来到浙江与福建分界处的仙霞岭，然后转道去了福建南平，经永安、长汀到赣州，转入赣县基督教联合中学，这所学校成为“秀州中学在战时的化身”。^④

到达赣州后，秀中师生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办学时期。“同学方面，第一学期共有460名，以后逐期增加至510名止；相反的，战区同学逐期的减少，因为毕业的、转学的、纷纷离校他往。而战区归来者已告停顿。总计全校同学男生占80%，女生占32%（原文如此——作者注），住宿生及通学生各占半数。基督徒及慕道友同学占全校之1/4。自战区来校者初为168名，其中2/3来自江

① 王文江：《母校师生奋斗之我闻》，《秀州钟》复刊第一期，第16—19页。

② “华东区基督教联合中学已开始招生”，载《真光杂志》第37卷第3号，1938年3月，第53—54页。

③ 可拔：《秀州在孤岛》，《秀州钟》复刊第一期，第20—21页。

④ 毛承恩：《秀中转进浙赣侧写》，《秀州钟》复刊第一期，第22—25页。

浙23所教会学校,1/3来自各省28公私立学校。省籍占全国之半”。在赣州期间,自助产业、宗教工作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师生度过了3年相对和平的岁月。^①

3年相对安静的赣州教学后,日军的进犯迫使秀中再次迁移。从赣县到丰都,再到会昌,最后到达寻邬,转辗500里。^②在寻邬三个月内,各项工作尚属稳定。“我们的建设不仅是在学校里的,更还要遍及到社会而深入民间去。宗教方面曾到看守所去宣传福音及为罪犯写信;文化方面有《寻风月刊》的出版,介绍和报道些民众的常识以及时事科学之类,是一种有着实效的贡献”。秀中这样的行动,赢得了当地政府和士绅的肯定。然而,粤赣边境战火蔓延,秀中被迫再次流亡到了长汀,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重新办学,直到抗战胜利。^③

二 “孤岛里作道场”:之江大学的“国族”品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流亡到“孤岛”的江浙各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分别成立了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和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可谓是“孤岛里作道场”。有关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的情况,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证,这里不赘言。笔者将以当时浙江省惟一一所基督教大学——之江大学为个案,讨论浙江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孤岛”坚持办学的状况。

1937年12月23日,杭州沦陷,同日,之江校长李培恩携家人来到上海公共租界,预备在“孤岛”租界办学。翌年1月14日,之江董事会特别会议决定在上海租界重新开学。2月19日,之江大学在博物院路128号广学会大楼重新开学,共招收21个班级,185名学生。^④之江大学虽然在“孤岛”重新开学,但是教学设备和教职员均有欠缺,学校规模仅为早先的1/3。在上海重新办学的其他教会大学,亦遇到类似问题。故在1938年1月19日至21日举行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会议上,之江、沪江、圣约翰等7校通过联合办学决议,内称:基督教教育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学校来应付目前的紧急状态。因为基督教教育面临着更重的任务,但是只有很少的资源可供利用,“这就不仅要求各校牺牲个人利益,尽量少强调一些那种使我们各自为政的个别利益和附属关系。此外,更要求各基督教教育机关作出结构性调整,以联合、合作和分工的方式加强合作”。^⑤会后,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正式成立,并马上刊登广告,开始招生:“因此次战事,基督教13所大学中,受影响者达七八校,故拟联合各大学,下学期先行在沪谋补救办法,使学生学业不致荒废。凡东吴、齐鲁、之江、金陵、金陵女大及其他基督教大学学生,尚未入学者,无论经济情形如何,希即至圆明园路169号4楼登记,俾便为下学期计划根据。”^⑥

团结奋进是“联大”设立的初衷,在此框架内,之江大学的战时校务稳定发展。从1938年春季学期的联合校章中可以看到,之江大学共有17名教师开设了53门课程,其中生物学2门、化学5门、国文4门、经济学10门、教育学4门、工程学14门、英语3门、历史2门、数学2门、哲学宗教3门、物理2门、政治学2门。^⑦可见之江大学此前的复学行为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学校经费看,“联

① 厉一飞:《赣江三年回忆录》,《秀州钟》复刊第一期,第26—27页。

② 蒋凤起:《五百里征途》,《秀州钟》复刊第一期,第28—31页。

③ 金炳麟:《最后的奋斗:寻邬——长汀》,《秀州钟》复刊第一期,第32—34页。

④ “President Report, 1937—1938”, in “UBCHEA”, 160—3016.

⑤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CCEA, Jan. 19—21, 1938, 上海市档案馆藏馆藏, 档号:Q242—317.

⑥ “基督教教育协会办理大学生登记”,原载《时报》1938年12月24日,《真光杂志》第37卷第2号,1938年2月,第48页。

⑦ “Courses Offered by Ginling College, Hanchow Christi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Nank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Soochow University and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Spring Term, 1938. 上海档案馆藏, 档号:Q242—317.

大”框架非但确保之江大学有充足的经费支付教职员薪金,而且略有盈余。如1938年偿还了3750美元旧债务^①,到1939年初,之江大学除归还所有欠账16329元外,实现盈余20287元。^②鉴于此,学校行政会议作出“除非目前战争形势彻底扭转,秋季将不迁回杭州复校”^③的决议。

为了进一步协调“联大”事务,保证校务稳定发展,1938年7月20日,在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协调下,圣约翰、沪江、之江和东吴四校成立“基督教大学上海协会”,该协会以“充分谅解每所大学将继续保持它的身份、法人资格和独立性”为基础,由四校校长组成执行委员会,下设事务、联合图书馆、联合实验室、体育四个委员会,协调处理四校联合中发生的事务。^④在该协会主持下,之江大学的各类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据之江大学某生记载:“看这位于南京路上的七层大厦,每天来来往往的学子,或西服革履或高跟烫发,夹洋书,操洋语,拥挤于电梯之内,过道之中,战前任何大学也没有如此五光十色的热闹。所以今日处在这‘孤岛’上的学士,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中过日子,早上抢公共汽车,到校抢电梯,上课抢座位,下课抢图书馆,中午抢饭馆座,每天是在这五抢也可以说是五挤之中过日子,这样的争先恐后的精神,放在后方也许是太大材小用了,但这种练习也不见的没有好处吧!因了这大团体的集合我们还须感谢战争,不然这几千来自华北、华中、华南的儿女们如何会相聚一楼呢!”^⑤“基督教大学上海协会”存在的结果之一便是“联大”校务开始真正整合为一体,1940年,“联大”校章规定一切课程不再按校排列,而是按专业划分,在具体课程名称下指明开课教师和所属学校。^⑥

在“联大”框架内,之江大学校务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办学规模甚至超越战前水平,详见下表。

表1 之江文理学院学生数、教师数、课程数统计表(1938年春—1940年春)

	1938年春	1938年秋	1939年春	1939年秋	1940年春
学生数	185	474	469	642	617
教职员数	17	52	61	67	93
课程数	53	79	97	100	100

资料来源: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75、L052-1-136。

然而,“联大”框架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之江大学作为外来户,在利用“联大”资源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以图书馆利用为例,“联大”图书馆是在圣约翰图书馆基础上建立的,“以距离关系,教职员学生课余往返图书馆较感不便”。^⑦1939年“联大”各校学生利用图书馆调查显示,占有“地利”优势的圣约翰学生利用率超过80%,其余三校加起来不到20%,其中之江仅占5%。^⑧为此,之江只能将从杭州校园运出的一批图书资料在博物院路广学会大楼6楼自行开设新图书室两间,“除一间做学生阅览室外,另一间专供各教授浏览参考之用”。^⑨

之江大学在“联大”框架内校务开展方面遭遇的困难,使得之江校方在未来的“联大”实体化办

① “President Report”, 1937—1938, in “UBCHEA”, 160—3016.

② 《之江大学收支状况表》,1938—1939年,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262。

③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Committee on Future Policy of Hangchow College”, April 11, 1938, in “UBCHEA”, 160—3016, p. 21.

④ “The Associated Christian Colleges in Shanghai, Basis of Association”, July 27, 1938,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42-6。

⑤ 简因:《基督教联合大学生的衣食住行》,《之江大学年刊》,1939年。

⑥ “The Associated Christian Colleges (in Shanghai) Advanced Courses, Fall Term 1940”, in “UBCHEA”, 160—3016.

⑦ 《之江大学通讯》第4期,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8(1)。

⑧ 《1939年之江大学简明教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101。

⑨ 《之江大学通讯》,第4期,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8(1)。

学中,倾向于和非上海的东吴大学合作办学,以凸现之江自身的独立性。1939年4月17日至22日在香港召开的基督教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上,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就上海“联大”合作问题提出一份《未来发展方案》的报告,主旨是在“联大”办学模式的基础上,谋划一个实体化的真正联大以“最大限度地承担这个国家的教育任务”。^①该份报告称:“为了基督教大学上海协会能够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我们相信:第一,在经验和条件允许的基础上,尽快贯彻更为彻底和有效的合作政策;第二,尽快制定计划,使那些希望继续合作办学的大学更好地联合在一起;第三,为实现上述两项目标,应该寻求经费和适当的地方,以便建设校舍。”^②

对此计划,各校所持态度不一。之江大学方面,据明思德的校务报告:“在日前形势下,欲谋将来之计划亦殊困难。但吾人深信对于应有永久合作组织重要性之认识已有进步。此种觉悟是否坚强,足以胜过所有之困难,尚待未来事实之佐证。”虽然“此事是否能实现难以断定”,但之江大学明确表示愿意与东吴大学在上海作“永久合作计划”。^③1940年11月10日,之江大学与东吴大学达成协议,两校高年级部分将在上海继续合作,低年级部分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自迁回原址办理。^④双方约定:第一,在联合办学计划范围内,高年级部分的课程由两校相应院系负责;合并两校重叠之课程,如文学院的中文、英语和政治科学,商学院和化学工程,其他院系仍保持各自的特点,独立办学。第二,学生组织方面,除选择联合课程的特殊班级外,其他班级组织和学生生活,均照低年级模式来操作。在课程目录方面,联合教学课程将在两校各自的课程总录里单独列出,供两校学生自由选择。第三,在师资方面,参加联合教学计划的教职员将组织成一个单独的系,从两校的杰出教师中选举一名系主任,经两校校长联合任命后方能上任。其他教职员的任命,得遵守两校校长均表同意方能任命的原则。第四,关于联校经费,由两校平摊;每位学生的费用将被添加到教师的工资,故两校得根据学生数量承担相应费用。^⑤据此协议,1941年春,两校文学院首先联合办学。但是,联合办学的巨额经费远远超越了双方最初的设想,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两校再度迁离,合作办学就此陷于停顿。

1942年1月28日,之大召开第四十次院务会议,校董会决定因时局转变暂停开学。^⑥学生一分为二,一部分随校首先迁移到金华,最后流亡到福建邵武。据称,之江大学由训导长顾琢任先行赴金华筹备内迁地点,主持内迁事宜。4月中旬,李培恩抵达金华,并与东吴大学代表商谈迁校事宜,两校决定群赴邵武。5月初,浙赣战事爆发,金华危在旦夕,之江与东吴先后撤离金华,转赴邵武,与福建协和大学联合办学。之大除教职员另租宿舍外,男女学生均附于福建协和大学学生宿舍。学生所用书籍,除少数自备外,皆利用福建协和之图书馆;在科学仪器方面,之大采用租赁方式使用。两校在课程方面亦彼此合作。1942年,之大学生在福建协和大学选课者达686名,福建协和在之江选课者亦达394名。^⑦另一部分继续留在上海,入上海各基督教大学所办的临时补习班。当时“联大”停办后,因需要撤退迁移学生人数过多,难以全数撤退,“为顾全学生的学业,学校开设了补习班,由各系分头办理,以九星期为一期”。之江学生一部分转入圣约翰和沪江,一部分转入本校

① J. I. Stuart, "Correlation of the Christian Colleges, A Suggested Starting-point", April, 1939,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 Q242-317。

②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Presidents of Christian College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Hong Kong, Apr. 17-22, 1939,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 Q242-318。

③ 《1940年度之江大学院务报告》, 浙江省档案馆藏, 档号: L052-1-80。

④ "Letters of Robert J. McMullen", Jan 18, 1941, in "UBCHEA", 160-3034。

⑤ 《东吴和之江大学联合计划》, 1940年11月10日, in "UBCHEA", 160-3034。

⑥ 《之江大学第四十次院务会议记录》, 浙江省档案馆藏, 档号: L052-1-10。

⑦ 《1942年度之江大学院务报告》, 浙江省档案馆藏, 档号: L052-1-80。

老师所办补习班。教职员中，一部分转任圣约翰或沪江教职，一部分则改行，从事其他职业。^①

浙江沦陷期间，各基督教教育机构“共赴国难”，在流亡中坚持办学，很好地实践了前文所说的基督教教育“国族”观念觉醒中所提出的实践“国民”责任的两条途径：“负责任”地救国和“理性”地救国。嘉兴秀州中学一位学生对抗战期间秀州中学流亡办学意义的总结，亦可视为整个浙江基督教教育“弦歌不辍”意义的概括。该生说：“战时的秀中，以特殊惊人的姿态树立起基督教教育的大旗……她所享的盛誉，她所教造就的青年，她所有承先启后的功业，是弥足珍贵，是要占基督教教育史上的……一页的。”^②此言确切。

三 “身份叠合”：抗战与浙江基督教教育“真正的公民权”的获取

早在 20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有关基督徒的双重“身份认同”问题就引起了教会内部人士的关注。九一八事变后，教会内部关于基督徒所具有的“上帝的选民”和“国族的国民”这两种身份的冲突问题，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答案，即基督徒即是上帝的选民，也是国族的国民。“为天国的选民，也有选民应尽的本分。那么你一方面做本国的国民，是否就应该听敌人侵略深入刀俎鱼肉，一切抱无抵抗主义呢？神的典赐我们有一个国籍，而我们不用心用力，牢牢保守，以至于有灭亡的危险。这是如何违逆神旨！大伤天父的心……由此得一结论，凡基督徒爱国卫国，要站在众人面前，做榜样给人看”。^③及至抗战爆发，两种身份几乎实现完全契合，曹新铭认为：“基督徒固为上帝的子女，但也是国家的人民、照《圣经》的教训，人民在不背信仰上帝的原则上，应服从掌权的人，应尽国民义务。”^④罗文清亦强调：“基督徒不但如同世人一样的要尽其为国民的本份，还要尽其天国子民的本份。他们向国家社会有责任，向教会又有责任，所以谓双重责任。这话是很实在的。尤其是在此国难严重当中，基督徒所负的这双重担子更加重大、更加显而易见，且更加刻不容缓的要负着。”^⑤在他们看来，基督徒兼具“教徒与国民”双重身份，因为国难而叠合在一起，难解难分。

基督徒身上兼具的“选民”身份和“国民”身份的契合，同时也是基督教教育兼具的身份重叠。就创立初衷而言，基督教教育的确是作为“上帝的选民”来执行使中国基督化的使命；作为中国私立教育的一部分，基督教教育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又不可避免成为中国的“国民”，在民族大义面前，必须履行“国民”义务。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14 年抗日战争中，基督教教育身上兼具的这两种身份，不但发生了契合，而且先后秩序发生了变化：“国民”身份开始优先于“选民”身份成为基督教教育服务中国社会的抉择。因为在基督徒看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维护公道正义和民族独立的真正的“抗战”。“中国此次的抗战，不只是为着自己的民族国家的生存而战，也是为着‘世界人类的正义公道而战’。因为日本这种贪得无厌的侵略，凶狠残暴的行为，是破坏世界正义，摧毁人类公道的。世界不欲维持正义，人类不欲主张公道则已，不然这种破坏正义、摧毁公道的妄念恶行，是应当铲除的。中国固要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求生存以尽天职，同时还要维护世界人类的正义和

① 《1942 年度之江大学院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80。

② 毛承恩：《秀中转进浙赣侧写》，《秀州钟》复刊第一期，第 25 页。

③ 张之江：《乡村牧师当提倡国术》，《金陵神学志》第 14 卷第 7-8 期，1932 年 10 月，第 11-12 页。

④ 曹新铭：《基督徒对于战争的态度》，载《真光杂志》第 37 卷第 7 号，1938 年 7 月，第 2 页。

⑤ 罗文清：《国难中信徒的经济责任》，载《真光杂志》第 37 卷第 9 号，1938 年 9 月，第 6 页。

公道尽义务”。^①杨惠福也称“因为救国救民的工作，我们也不当后人”。^②

吴雷川认为，国难期间，基督教与中华民族复兴之关联，即在基督教教育为中国“造成领导民众的人才”，这些领袖人才，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积极的有为，就是要有宏大的志愿、坚强的节操，勇敢奋斗以至于牺牲的决心。一是消极的有不为，就是要严格的律身，所有种种内蕴的私欲和外来的引诱，凡是足以妨碍自己伟大事业的，必要抑制与拒绝”。^③纵观抗战期间的浙江基督教教育，虽然蒙受巨大损失，但各校之行为，恰恰符合吴雷川所界定的为中国“造就领导民众人才”的两个标准。它们坚持抗战，在流亡中办学，弦歌不辍，直至停办，是谓“积极的有为”；它们严格律己，抵制寇伪诱降和大后方安逸生活，是谓“消极的有不为”。

先从“消极的有不为”说，苏达立观察到，“只要遵照日军苛刻的条例，学校也可以恢复。但英美教会学校宁可关闭，或在自由中国复校”。^④不愿事敌的结果，浙江基督教教育损失相当惨重。据统计：“战前华东一区基督教学校，有大学6所、中学70所。小学百余所，学生计大学3600人，中学15000人，小学20000人。教师则大学有300余，中学4500余人，小学1000余人。经费方面，大学计每年经常费1500000元，中学1000000元，小学500000元。合计校数180所，学生40000人，教师5000人，经常费3000000元，为全国基督教教育之最占重要地位者。八一三后，华东区适处政治要枢，各校校舍，或已变为瓦砾、或已被日军占用，或已改设收容所及难民医院。校具之被移、被劫、被捣毁者。所在皆有。损害之大，可谓空前。其中校舍之毁坏最甚者……嘉兴之秀州、湖州之明德及湖郡各校。”^⑤以甬江女中为例，“惟五载沦夷，校中总舍遭毁，余屋虽存，而校具损失殆尽”。^⑥

从“积极的有为”方面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大学课程设置做过一次重要的调整，其核心思想加强爱国精神的塑造，增加能够服务战争的实用课程，减少文科和社会科学。^⑦之江大学以文理见长，但是由于该校在抗战爆发前，即注重实用科学，如社会科学中的商科和理工科中的工科，有相当的基础，故能够很好地适用战时所需，为抗战培养了不少人才。例如，1938年秋季学期，之江大学经济系和土木工程系（包括增设的建筑系）的师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全校所开79门课程中，经济学占12门，工程学占22门，共占课程总数的43%。^⑧另据1941年的之江校务报告，以往理科学学生约占全校学生54%，文科学生占46%。分设三院后，文学院占20%，商学院占29%，工学院占51%。^⑨李培恩在设置工科发展时指出，之江的工科与圣约翰的工科相比，不但专业多、课程多，更重要的是之江推行的是四年一贯制的专业教育，注重实践训练。^⑩李培恩说，之江工科“注重学生有实验或实习之机会，俾理论与实际并重”，所开课程中有实验或实习者占全部课程的30%以上。^⑪之江培养的实用人才，从1932—1939年的毕业生人数分配表和1940—1941年之江各院系学生人数中也可以窥得一斑。

① 编者：《由中日战争联想到灵欲的交锋》，载《真光杂志》第36卷第10号，1937年10月，第1—3页。

② 杨惠福：《战时传道人的工作当如何去做》，载《真光杂志》第36卷第12号，1937年12月，第3页。

③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④ 吴华民著：《苏道使忆华》，第58页。

⑤ “华东区基督教学校战时损失惨重”，载《真光杂志》第37卷第12号，1938年12月，第69页。

⑥ 《甬江女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第2页。宁波市档案馆藏，档号：旧10—1—104。

⑦ 参见刘家峰：《论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关系》，《史林》2004年第3期。

⑧ 《1939年度之江大学院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136。

⑨ 《1941年度之江大学校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75。

⑩ “Baen E. Lee to Dr. Lloyd S. Ruland”，June 26, 1941, in “UBCHEA”，RG11-160-3030。

⑪ 《1941年度之江大学校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75。

表2 之江文理学院毕业生统计表,1932—1939年

年份	文学院						理学院			
	国文	英文	政治	经济	教育	合计	化学	生物	工程	合计
1932	5		5	3	4	17	4	1	6	11
1933	5		5	8	4	22	10		7	17
1934	4	1	7	16	5	33	6	1	8	15
1935	11	1	5	30	8	55	5		10	15
1936	7	5	6	20	11	49	9		23	32
1937	2	1	1	12	17	33	2		11	13
1938	2	2	2	2	8	16	1		12	13
1939	1	2		17	1	21	1		27	28
共计	37	12	31	108	42	230	38		104	144

资料来源：《1939年之江大学校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78。

表3 之江文理学院学生人数统计(1940年春—1941年春)

年份	文学院	商学院	工学院	总数
1940春	75	174	368	617
1940秋	150	221	336	707
1941春	204	245	496	918

资料来源：《1941年度之江大学院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74。

之江大学注重实用科学，大力发展工科，因此而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扬，亦得到了教育部的经费资助。“教部对于本院实际之补助甚多，在沪校舍之租金，及其他特别开支，均有资助”。^①之江的工科毕业生，也乐于服务国家社会。据统计，1937年有6名之江毕业生，其中4名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前往后方从事战时服务。1938年有3名毕业生，其中2名为土木工程系毕业生；1939年则有15名毕业生以铁路、工程方面为主，服务战区，其中男生12名，女生3名。^②

一言以蔽之，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基督教教育无论是“消极的有不为”还是“积极的有为”，都为它们实践自己的“国民”身份，作了最好的注释。同时，也为它们赢得中国“真正的公民权”。例如，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5年12月29日第66005号代电中称：“各文化机关学校于抗战期间横遭敌人焚毁轰炸，损失甚巨。现值复员伊始，将该所及所属机关学校之图书、仪器，以及房屋家具等因战时所受之损失，分别开列名称、种类、数量。估价缮造清册，房屋可附照片简图以及今后回复工作之一切需要，详尽列表说明。”^③浙江省教育厅按照这项规定，命令所属学校“十日内遂照规定详细列表具报”。^④

基督教教育方在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后，亦开始遵命享受自己的“国民”待遇，积极向政府申请资助。以甬江女中为例，它在接到这项命令后，除了登记造册该校在抗战中损失清单外，详细罗列复员工作所需各点：“（一）重建总舍；（二）修添校具；（三）购置理化仪器；（四）建造教职员住宅；

① 《1939年度之江文理学院院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80。

② 《1939年之江大学校务报告》，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052—1—187(2)。

③ 教育部第66005号代电，1945年12月29日，宁波档案馆藏，档号：甬10—1—313。

④ 浙江省教育厅桃字55号代电，宁波档案馆藏，档号：甬10—1—313。

(五)充实图书。以上五项计划,付诸实现需款以万万计。”^①另一份请求教育厅补助的呈文称:“兹抗战胜利,国土重光,本校尊命复校,然复员伊始,百废待举,校舍校具急需修建添置,急需款项而学校经济相形拮据,为特备文呈请钧长鉴核,准予发给补助费(二十)万元,以利教育而惠青年。”^②弘道女中在复校中,已获得浙江省教育厅10万元的补助。^③

“莽莽禹甸,芸芸黄裔,在有亡国灭种之虞,而吾侪青年,曷不投袂以起”。^④奋起抗日的浙江基督教教育,用自身的努力,修正了晚清以来被固定化“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旧时的形象^⑤,谱写了中国抗战史、教育史上最绚烂的篇章。

(周东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甬字第21号,1946年5月10日,宁波档案馆藏,档号:旧10—1—313。

② “为呈请虑给学校补助费仰祈鉴核照准以利教育由”,宁档:旧10—1—313。

③ 《弘道36周校庆纪念刊》,杭州市档案馆藏,档号:旧36—1—13。

④ 赵云凝:《孝之正解》,载于《弘道20周年纪念刊》第727页,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旧36—1—12。

⑤ The S. C. M. in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 1939, p. 30. 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20—0—329。